



胡烟出生在山东^①崂山岛，与连接了我少年时期生活的林野，二者直线距离大约只有20里。那是一个南、北、西三面环海的半岛，宛如一只长柄勺伸向渤海。这里环境幽静，空气清新，水质清静，沙滩白细平缓，是最好的养生地。相传，元末明初之时，大将军胡大海由于长年带兵随朱元璋征战杀伐，便把老母亲寄养安置在这个岛上，“^②配^③”（寄母）一名即由此而来。

崂山岛的确有很多人姓胡，或许都是胡将军的后裔。胡烟从渔村走向北京，取得文学硕士学位并做了报社编辑。多年来她采访了大量文化人物，书写了近百万字的访谈文章。她眷恋家乡，以敏锐的目光，回望半岛人的生存，记录了故乡消失与重生的过程。散文集《哭泣的半岛》，既是对故乡的情感回馈，也是她厚积薄发的文学成果。

胡烟的文字充满爱。她爱大海，爱家乡，爱海边的人。她与崂山岛一同欢乐一同悲伤。裸露的礁石，无垠的海滩，荒蛮的山野，白细的沙子，鲜活的生物，奔跑的禽鸟，一并汇入其笔下。

爱如银钱穿珠，形成了《哭泣的半岛》。大海与人共同构成了书的主角。胡烟的文字中活跃着一个个灵动的生命，以血肉爱恨演奏出一曲半岛交响。

胡烟笔下的人物大都生活在最底层，他们世代以赶海为生，于惊涛骇浪中繁衍生息。这些半岛人厚道善良，如“父亲”爱惜生灵，打到小鱼小虾会放归大海，捕到大螃蟹，也会放归大海，说：“小鱼小虾正在生长，大鱼大蟹长大不易。”外地杀人犯跑到北山跳海，正在驾船的“爷爷”二话不说跳进海里将他救出……这些海与人的画面真挚感人，给人以异样的温暖。

《哭泣的半岛》的另一个主角是动物。在胡烟笔下，狗、狐狸、刺猬、黄鼬等，都是有灵性有情感的美物。半岛人都姓胡，“胡”“狐”同音，因此大家对狐狸格外亲近敬畏，称之为“狐仙”。传说狐仙法力高强，可幻化成人形。半岛上的狐狸会嫁女，会取水，会站在房顶上集体跳舞……书中讲述的“狗偷肉吃”、“狐狸压水”、“刺猬脱逃”等故事，融传说、亲情、智慧于一体，阳光正义，颇得《聊斋》神韵。

这是一部饱含海水咸味、弥漫泥土芳香的崂山风情画，是原汁原味的渔村生活图景。

胡烟的文笔游刃有余、朴实灵动、诙谐幽默。儿时趣事、家中琐事、半岛大事，她皆信手拈来，一吐为快，成为笔下的话题和说辞，读来令人欲罢不能。如《黄鼠狼报仇》：“大黄狗有半个人高，年富力强，从南院窜到北院，来回跳腾着，像是巡视，也像是发泄过剩的精力。”再如《我弟》：“我弟学武术，一学五六年，回家练个后空翻，算是向我爸汇报工作。”又如《小姨》：“记忆里，小姨家的门是黑的，抑或是深紫的，幽闭了一院子的秘密。”

我读这些文字，体味到的是半岛之美。我相信一个异乡读者，也一定会被半岛之美深深地打动，并心向往之。

但遗憾的是，宁静的半岛已经消失了。胡烟眷恋故乡，企盼半岛重生。所以，读她笔下爱恨交织的文字，更有了别样的况味。

张炜

小说家应该能够在复杂的社会形态、历史空间中真切地反映现实，用通透、鲜活但不谄媚的表达解构普通人与政治、时代和文明流变中的关系，作家秦岭显然具备这一优势。近期，北岳文艺出版社推出“小说眼·看中国”丛书，精选了全国50多位作家的中短篇小说作品，共汇编10部，其中秦岭的个人作品集占了3部，分别是《不要你娶谁》《借命时代的家乡》和《透明的废墟》，其中《透明的废墟》是专门反映地震灾难的小说集，前两部作品集则精选了秦岭自2003年以来在各大期刊发表并受到好评的作品。这些小说被学界认为具有“新鲜又沧桑的异质气息”，运用“别开生面的叙事方式”，体现出秦岭解构公共事件的能力和独特性。

以农民精神为切入点揭示出人性合理欲求和现实残酷交锋的荒诞

杨显惠认为：“秦岭笔下的乡村由于历史、民族、社会、文化的关联性而笼罩在一种精神气场下”，此观点颇为中肯。秦岭以“尖山”作为自己的文学之域，描写了生活在那里的乡民日常生活中的喜怒哀乐。这些小说转载率普遍较高，且常登上各类小说排行榜，就是因为它明显超越了对现象的捕捉而直逼农民的灵魂。

中篇《借命时代的家乡》中的董、苟两家之间本来是由宗族乡规维系的、根深蒂固的农家传统关系，可是面对“破四旧”、“文革”、联产承包、市场经济等一系列外力的影响和冲击，传统的价值观、道德观被逼到了博奔的浪尖。主人公董建泉“忘恩负义”的婚变、违背常理的叛逆、勤劳发家的成功以及对伦理坍塌的救赎，构成了新时期农民在物质和精神层面上令人惊心动魄的现实状态。短篇《女人和狐狸的一个上午》以干旱缺水的西部乡村为背景，以一位孕妇和同样怀孕的狐狸之间既惺惺相惜、又彼此提防的心灵交融、博奔、救赎为主线，毅然用低贱的生命向物质社会对资源的掠夺、人性的冷漠、社会的不公进行挑战，向物欲横流的社会规则发出强烈的批判。

中篇《绣花鞋垫》《不要你娶谁》、短篇《破牙的沙》《本色》等属于秦岭的“乡村教师”系列。面对城乡经济的巨大反差，“三农”问题的蔓延和农民传统地位的沦陷，秦岭对乡村教师的尊严危机、人格变异以及“娶妻难”等问题报以深深的同情和忧虑。校长纵容光棍教师找女学生为妻、女学生攀附男教师，当这种看似严重违背师德师风、社会伦常的“歪风邪气”成为稳定师资力量、保证教育教学的现实需要和主流时，秦岭已经为我们观察农村社会在希求改变方面提供了非常

在当代文坛，刘庆邦无疑是一位优秀的、有重要影响力的、有自己鲜明风格的现实主义作家。刘庆邦对现实主义的坚持已有几十年，他执著、决绝、“一根筋”，甚至表示要将现实主义进行到底。他坦言：“我这一生在创作上无需更多的主义，能把现实主义的路子走到底就算不错。”刘庆邦的长篇小说《黑白男女》2015年春天在《中国作家》全文首发，上海文艺出版社重点推出，连载众多，受影视青睐，好评如潮，并荣获“鄂尔多斯文学大奖”。《黑白男女》的心灵化、诗意化、哲理化，《黑白男女》的大爱、大善、大悲悯，《黑白男女》的语言、结构等要素的成功构建，不仅使刘庆邦在现实主义道路上越走越深远，而且使现实主义兼收并蓄，拓展深化了现实主义本身。

《黑白男女》仍旧写矿难，井下发生了瓦斯爆炸事故，一次炸死了138名矿工。许多家庭幼年丧父、中年丧夫、老年丧子的悲剧集中在众多矿工家庭上演。这本来是一个重大的悲情题材，生活像铅球一样落地生坑，生死离别的冲击惊心而惨烈。刘庆邦将巨大的悲剧作为一种视角、一道侧光、一个切口，他没有正面铺陈瓦斯爆炸后的善后处理，而是另辟蹊径，静水流深、不事声张地叙说了周天杰、郑庆生、卫君梅、蒋妈妈、秦凤玲等五个家庭成员重大灾难后的心灵轨迹、生活状况和命运抗争。矿区那些芸芸众生，悲痛中蕴藏着一一种坚定、庄严和倔强。在苍凉灰暗之上，小说的调子辉映着亮光、温情和暖意，超拔出绝望之后的希望，将死之悲哀和生之顽强、殒亡废墟与新生活开启筑成了一曲悲壮的生命礼赞。

“事如流水兮逝如风，不知何处事兮何所终”。世道人心是复杂、混沌、多变的，有多种可能性，线性思维于事不逮，辐射思维才是正大一途。因此，复杂、厚重、丰饶、饱满是优秀小说的题中之义，特别是长篇小说。《黑白男女》娴熟、老到、精准的叙事始终在人物、心灵、细节中深入掘进，从而回应了我们这个复杂多变的时代。比如小说主要人物卫君梅。卫君梅的处境是多么复杂、尴尬，吊诡，她的所谓尊严、坚强与操守，是多么地脆弱、野蛮与扭曲，多么地不堪一击。爱情在某种范围内是环境的产物，也是文化的产物。压抑、控制爱的冲动，将生存与生活作为首要人生标准，这是无奈而悲凉的。卫君梅面对风华正茂的青工蒋志方不是没有动摇过、遐想过，她曾勉强接受了蒋馈赠的手机，最后又在众目睽睽之下坚决奉还。她想爱，想婚姻，想有一个完整家庭，但她不敢爱、不能爱，更不能重新结婚。刘庆邦真正展示的，也许是“爱情名义”背后复杂、尴尬和难处的人际关系，是坚硬如铁的“法则”，是生存和生活的艰难，是惧怕家庭再生变故，是失去房子等更多难以预料的风险。卫君梅已经爱不起，改变不起了，因为要付出的成本太高了。这都是她不能承受的爱之沉重。为了稳定现有的家庭秩序，她必须放弃所谓的“爱”或者“同情”，压抑对新生活的向往。小说中洗煤厂女工杨书琴一语道破天机：“她要重新嫁人了，房子恐怕就保不住了”。其实，杨书琴、秦凤玲们对再婚的想法是相同的，她们一门心思要拉住一个男人，否则日子是熬不下去的。但卫君梅有自己做人的底线，必须要抛弃非分之念，对多难生活中的所谓“爱情”有一个基本判断，她想活得真实，对自己负责，对孩子负责，言行一致，这关乎她继续生存的脸面与勇气。当她下决心还手机斩断情思之后，对她素常敬佩的郑宝兰终于忍受不住，对卫君梅大发脾气，“最后一根稻草”同样把郑压垮了。反常为妖。

好作家是社会的代言人

——从秦岭的小说谈起

李 丽

出了民众在权力空间里的卑微、妥协与残忍。

《风雪凌晨的一声狗叫》被评论者誉为“我国第一部公开反映计划生育的中篇小说”。省、市、县、乡、村各级领导干部悉数登场，竭尽全力搜寻超生妇女爱爱，而各色人等面对政策、计生任务、劳动力现状，处理公事与私心、压力与人情的关系时，却各怀心事，暗度陈仓，欺上瞒下。而那一一声神秘的狗叫，把各级权力统统治聚集到斗智斗勇的人性平台上来，揭示了权力与乡村社会复杂、隐晦的现实形态。

《烧水做饭的女人》中的乡党委书记田博才掌控着民办教师的转正、职称、任命大权。于是，主人公花儿为了丈夫的前程和学生们的未来，面对田博才的淫威和胁迫，由最初的蔑视、抵抗、巧妙周旋到最终委身于田博才，用自身的屈辱换来了丈夫的尊严。作者力透纸背地写出了弱小者和权力交锋的残酷性，也印证了刘墉“荒诞是现代人所面临的根本生活困境，现代人被迫入这种困境无处可逃，他惟一能做的就是面对荒诞，并在这种荒诞中生存”的断言。

在中篇《皇粮》、短篇《碎裂在2005年的瓦片》等“皇粮”系列作品中，一个小小的“验粮官儿”，就可以在农民的生存、生活层面构成难以企及的强大权压，有一点点的职权就可以让寡妇解怀、杜壮低头，甚至可以让乡村的年轻人人格委顿。结果是，从服从权力到利用权力、淫渎权力就难以避免地构成了乡民最基本的价值追求和生存方式。这种对乡野权力的人性追踪和时代叩问，为我们打开了观察乡村社会的另一扇沉重之门。福柯说：“‘官’享有话语权，是权力的主体；而民之所以要臣服这种权力，是因为要借助

在心灵深处掘进——读刘庆邦长篇小说《黑白男女》

老 九

郑宝兰顿时让我们疑惑。其实这是小说家一种高明的叙事策略，让读者透过表象看本质、看复杂、看心灵深处的精神压力。同样猝不及防失去丈夫的郑宝兰也活得不容易，公公癌症、父亲瘫痪、母亲双目失明、孩子闹腾，要守住“身份”……她面对的大多是没有解的挠心事，谁予抚慰？与谁诉说？世俗生活，就是实在之笼，不管“城内城外”，她们都难承受，都到了崩溃的边缘。没有把握世俗生活实在本质的作家，哪能把握小说的心灵质感。刘庆邦重人道，重天道，有一颗赤子之心、悲悯之心、仁爱之心，故他的叙事道法自然。因为生活还要继续。

人要说话，小说家更是活在语言的氛围里。梅洛·庞蒂说：“因为在作家那里，思想并不从外面主宰语言，作家自身就像一种新的习语，它自己形成自己发明表达手段，并按照它特有的定义产生变化”。《黑白男女》的语言大俗大雅，大土大洋，洗尽铅华，它所使用的大白话带有地地道道的矿工味，特色非常鲜明，可以说与矿工矿区血脉相通、筋骨相连、水乳交融、诗意盎然。有评论家称，翻遍古今中外写煤矿区的小说语言，无人能出其右。我们看左拉的《萌芽》、劳伦斯《诺丁汉矿区》三部曲、巴尔多梅罗·利约《十二号风门》《胡安·法里尼亚》《地底下：矿工的景象》等，这些煤矿矿工小说的总体语言，显得过于板正、书面、游离，与主体生命缺乏血脉相连的互动、整合、共振，从“题材动力论”的意义上说有点王国维在《人间词话》中所谓“隔”的感觉。对此，刘庆邦早有清醒的认识。他认为：“人是环境动物，也是伦理动物。矿工是离开土地，离开田间耕作的农民，有农民的心态、农民的文化传统，只是他们比田野耕作的农民更艰难，更具有强韧的力量，这是一群看透生死的人。”中国的煤矿大多在城乡结合部，有的在山区丘陵地带，甚至深山，即使在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，有的煤矿仍然“通讯靠吼，交通靠走，娱乐靠酒，治安靠狗”，是一个相对封闭孤立的社会单元。它既有农村的特点，又有城镇的脉动，语言、风俗、习惯可谓自成一体。再加上矿工井下直接面对大自然，属高危行业，水、火、瓦斯、煤尘、顶板五“毒”俱全，从矿里上来，除了牙是白的，其他都是黑的。矿工们在井下就爱说“克拉邦语言”，男女那点事，如此的“软文化”“市场兴旺”。矿井下的语言是一种存在，一种强大、顽强的存在。忽视、忽略或消解这种语言，产业、环境、人物、故事就难以烘托出来，起码小说不够生动、到位、真实。《黑白男女》的语言几乎土得掉渣，既在泥土中滚过来，又在煤水中长久浸泡，连汗味中都有煤矿的气味，连牙缝里都有除不了的煤尘，连裤裆里都有又黑又亮一抖落散了架的煤渣，老少皆宜，妇孺皆通。比如小说“开头”一章：“采煤工不谈女人，煤炭产量低；机电工不谈女人，烧了发电机；掘进工不谈女人，巷道压得低；放炮工不谈女人，放炮如放屁”；杨书琴郑重其事地对青工蒋志方表白“我就是震动筛”；周天杰看自家的儿媳郑宝兰是一匹“母马”，儿子是“拴马桩”；秦凤玲说自己死去丈夫的领带是“裤腰带”；郑海生瘫痪在床时对瓦斯拟人化的

痛骂；矿工下班回家骑自行车上坡等于“上老婆”，等等。语言是内心的一种反映，能准确驾驭语言并与文本浑然一体是优秀小说家的硬功夫，是同化，是境界。《黑白男女》语言针脚结实、细密、生动、准确、传神、符合人物性格，是该作的又一大亮点。

刘庆邦是讲究技艺、控制感和节奏的作家，他熟悉小说的控制，认为当下小说的控制比放开更重要。庄子《庖丁解牛》谓：“臣之所好也，道也，进乎技矣”。控制是他技艺的“道”。《黑白男女》放得开，收得拢，但不紧绷、不拘束、不扭捏，一派舒展大气，自然而然。尽管切口很小，通篇布局却张弛有度，恰到好处，该交给读者的空间预留充分。我们再看《鞋》的“翻尾”，《西风芦花》的“虚写”，《种在坟上的倭瓜》的“抒情”等，就知道刘庆邦是多么注重小说技艺。《黑白男女》的结构，合理地吸收了中国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的积极元素，还有俄罗斯文学作品的恢弘以及欧美小说的技法，不故作高深，不卖弄前卫，明白清晰，简洁明了。整部小说设一“开头”，就叫“开头”，提纲挈领，引人入胜；然后是大量心灵化、诗意化的细节；设一结尾，叫“结尾不是结束”，余音袅袅，回味无穷。“凤头”“猪肚”“豹尾”齐活儿。每章节的标题也不玩花哨，意清字白，比如：第一章叫“没了儿子”，第二章叫“儿媳去了哪里”，第八章“我才不守寡呢”……小说中的人物起名，依百家姓而排，但去除了“赵、钱、孙、李”，从“周、吴、郑、王”开始。刘庆邦曾戏言“人生的目的在于生存”。他今年65周岁，已有小孙子，《黑白男女》中周天杰的小孙子戏份不少，并非闲笔，而是有人物参照，有体会、有感悟，故小来活灵活现，栩栩如生。周天杰与黄鼠狼的对峙是互有关注，互为仇敌，煤矿文工团到龙阳矿的演出，众亮相聚会等，都是小说的有机组成部分，使整部作品结构起伏跌宕，和谐黏帖。

读罢《黑白男女》，我想起了关于小说真实性的问题。真实源于小说家对自己最熟悉的人物、事物、环境、情感、心灵、语言等最基本的感受、审美、思考。刘庆邦是真诚地深入生活、拥抱矿工的，从20年前某矿发生瓦斯爆炸到《黑白男女》出版，他19年里时常想写这部长篇小说，为此写过长篇报告文学，写了大量中短篇小说《信》《清汤面》《别再让我哭了》《黑庄稼》等作铺垫，查阅了百万字的资料，到该矿和其他煤矿企业采访了多次，与有关人士深谈31次，积蓄了几十万字的笔记，再加上自己有农民、矿工、记者的阅历，这些文学作品与实证资料都为《黑白男女》的创作做好了充分准备，使他在矿工矿区中扎下来根，而且扎得深、广、实，故他在创作《黑白男女》时游刃有余，收获颇丰。

爱德华·纽顿在《聚书的乐趣》中说：“一个男人，或者一个女人，是世界上最有意思的东西；其次是一本书，它使人抓住秘密的核心。”刘庆邦在《红煤》后记中郑重写下了这样一句话：“煤矿的现实就是中国的现实，而且是更深刻的现实。”生活总是风云四起，变故不断，而男女分开，却这般容易，刹那之间。珍重，黑白男女！

辩，而当年和他一起掩埋连长的红军战士好不容易返回天水后，却因背负西路军“逃跑主义”的恶名自身难保。秦球面对“国民党孝子贤孙”的帽子和严酷专政，只好撒谎“当年埋藏的一个坛子里有红军的血衣，可以作证”。于是，他开始以挖山栽树的方式倾其一生寻找证据。他不可能找到坛子，却得到了生存的权利，并给光秃秃的大山披上了绿荫。严酷的战争和历史的错位，完全改变了一位普通农民的命运，可他艰难的寻找，却把中国农民的人性光辉提升到了极致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纪念长征不可或缺的全新形象。

《幻想症》中，“我”的奶奶原为西路军女战士，在河西走廊兵败被俘后逃到天水，改名换姓，装聋作哑，嫁给了“我”爷爷。她因不由自主说了梦话，被当作是阴鬼附体险遭驱逐。眼看身份就要暴露，她只好割掉舌头，这才“回归”正常的生活。她保留着当年掩护女战友脱险时所赠的一只玉镯，期待解放后相认，可谁会认她这位西路军“逃跑分子”呢？奶奶死后，“我”父亲替她继续默默期待着这位女战友。后来才知，当了“大官”的女战友离休后早已举家移民国外，当奶奶的女战友之子以爱国华侨的身份前来寻找玉镯时，“我”父亲却拒不相认，毅然把玉镯埋进奶奶的坟里。战争和历史让一些人成为受益者，也让另一些人沦为底层的“贱民”，可“贱民”骨子里对良心、道德的坚守，让我们在历史缝隙中窥视到了广博的乡村、大地对人类灵魂的锻造和升腾，这一点在同类题材中很少看到。

在中篇《英雄弹球子别传》里，孤儿弹球子从小就以身英雄人物为榜样，曾经从狼口里救下过小伙伴，而自己不仅被狼尾巴扫瞎了一只眼睛，连生殖器也被狼的一爪子抓得“不行”了，可英雄的荣誉让他无怨无悔。但在合作社、生产队、市场经济等一系列社会变革中，他英雄荣誉的含金量和精神光环也被屡打折扣。最终，他以扑灭碾麦场上一场大火的名义，让自己壮烈“牺牲”，既保全和“升华”了他这个光棍汉的英雄名分，也让全村精神文明建设“光芒”上了一个档次。弹球子的悲剧在我们这个不再崇尚英雄的时代，宛如一口长鸣的警钟，振聋发聩，而秦岭的农民立场和对历史的平视态度，直接把人物推进了历史和当代的双重现场，这是秦岭对当下乡土叙事的一个特殊贡献。

纪伯伦说：“一个伟大的灵魂有两颗心，一颗心流泪，一颗心宽容。”秦岭对中国乡村的纵深思考、深情回望和客观剖析，显然是基于其悲悯情怀和反思精神，这也印证了“好作家是社会的代言人”的说法。



这种权力。官与民都要对这样的现状负责或者付出代价，这就达到了一种双向辩证的哲学意味。”秦岭不仅对这种病态的权力进行了哲学和社会学思考，给予了揭示和鞭挞，同时也为读者提供了反思的路径。

从农民立场审视历史，拓展同类题材叙写的维度和格局

作为一名有思想、有担当的作家，秦岭从来不回避在小说中思考历史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他不是跟风追俗地站在知识分子角度俯瞰历史，而是直接站在农民立场平视平坐地对待历史，并把乡土叙事与相关历史紧密结合起来，从而在我们司空见惯的历史叙事中拓展了时空和主题维度，也丰富了读者审视历史的视界。

短篇《寻找》是秦岭以“家族”、史料结合而成的长征题材叙事作品，反映了长征时期天水人秦球球在国共两党的斗争中屡遭劫难的故事。他本来掩埋了一位红军连长的遗体，却在红军北上后，不得不向国民党撒谎掩埋的是保安团队长的遗体，并得到伪县政府的嘉奖。解放后，他有口难